

以阳明文化治心之道赋能贵州基层法治建设

■曹波 罗胜宝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基层法治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基,单靠刚性法律规制难以充分化解乡土社会情理交织的纠纷。王阳明龙场悟道奠定心学根基,依托在黔讲学的传道实践,阐发形成致良知、省察克治、改过责善、知行合一的治心体系,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德法共治要求高度契合,应善用这份本土文化资源赋能基层矛盾实质化解、轻微违法犯罪行为源头治理以及本土法治文化培育,构建富有贵州地域特色的德法共治路径。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阳明文化治心之道的时代意蕴

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引领,坚守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基本立场,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深度融合,构建兼具时代性、本土性与实践性的现代法治文化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以文化浸润法治、以法治涵养民心,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思想根基。这一顶层设计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融入基层法治建设划定了权威框架、明确了实践方向。

“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破解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适配融合的理论命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融会贯通。基层法治治理并非单一的法条适用与刚性惩戒,而是刚性规制与柔性教化、事后惩戒与源头预防、外在约束与内在自觉协同发力的系统性治理。基层治理实践中,单纯依靠法律强制手段,难以彻底化解家事邻里、乡土民俗类情感型利益纠纷,也难以从根源上矫正认知偏差、防范主观恶性较小的轻微违法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崇德尚法、息讼止争、教化育人、改过向善的治理理念,能够弥补现代基层法治治理的柔性短板。

立足贵州省情,多民族杂居的地域特征孕育情理相融、协商息争的本

土治理传统,鼓楼议事、民间调解、村寨自治等基层实践,依靠文化教化、民俗共识就地化解矛盾,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源头化解、柔性化解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阳明文化是贵州极具代表性的本土优秀治理文化资源,其心学体系发端于龙场基层乡土场景,天然适配贵州基层社会肌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活化阳明“治心”的治理智慧,推动传统教化资源向现代法治文化资源转化,能够构建契合贵州省情、彰显本土特色的德法共治新格局,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由“被动规制”转向“主动向善”、由“事后处置”转向“源头治理”。

二、阳明文化治心之道适配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法治内涵

王阳明龙场悟道奠定心学根基,在黔首倡知行合一,作《教条示龙场诸生》阐发改过责善思想,致良知、省察克治的思想源头亦可溯至龙场之悟并在后续讲学过程中得到系统阐发,形成以治心为核心、教化为路径、安民止争为目标的治理体系。

“致良知”锚定基层治理的是非价值本源。王阳明提出“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天理也”,主张人人先天具备辨别善恶是非之心,良知是普遍的价值标尺。从法治维度解读,良知对应公序良俗、社会正义赖以存续的民心根基。基层社会多数民间矛盾激化,往往不是当事人不懂法条,而是利益与情绪遮蔽了本心的是非判断,一味看重个人得失而漠视公共情理与规则边界。例如,涉赌信等轻微犯罪行为的行人为人多属普通民众、青年群体,大多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对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认知不足,侥幸心理或压倒价值判断。致良知的治理价值,就在于唤醒人内在的是非自觉,以共通的善恶认知调和私利诉求,为基层纠纷柔性化解、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认知纠偏提供精神支撑。

“省察克治”构建基层法治建设源头预防机制。王阳明在《传习录》载“省察克治之功,无时而又可闲”,要求人常向内心自省、检视心念,克制私欲,在恶念萌生之时主动自我匡正。该思想

与基层法治建设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防控逻辑相通,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源头化解的治理要求。于民间纠纷而言,省察克治思想引导群众主动克制冲突冲动,理性处置家事邻里争议,避免矛盾升级;于轻微违法风险防控而言,其能够引导民众识别网络黑灰产业陷阱,破除逐利的侥幸心理,从思想源头防范违法行为,推动治理由“惩治已然”转向“防患未然”。

“改过责善”契合现代认罪治理的教育挽救理念。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将改过、责善列为修身要务,提出人皆有过的,可贵在于知过能改,做到教化劝善而非一味苛责。这一理念与我国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恢复性司法、轻微违法教育矫治的精神高度契合。基层高发的帮信罪、轻微治安违法,行为人大多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较低,治理重心或不在于重罚,而在于教育悔过、预防再犯。改过责善的教化思路跳出机械惩戒思维,坚持教育感化优先,适配基层轻微违法处置与矛盾调处的柔性治理需求。

“知行合一”筑牢基层全民守法的实践根基。王阳明主张“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强调道德与规则认知不能停留在观念层面,必须落实于行动,做到认知与行为统一。放到法治文化建设当中,全民守法不只是知晓法律条文,更要法治思维转化为稳定的行为习惯。当前基层法治建设的突出短板,表现为部分群众知法却不信法、懂法而不守法,法治宣传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守法自觉。知行合一思想可推动法治认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育群众内生的守法意识,夯实基层法治建设的群众基础。

三、阳明文化治心之道赋能贵州基层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要求,结合贵州多民族基层治理特色与基层法治现实痛点,可从民间矛盾实质化解、轻微违法犯罪行为源头治理、本土法治文化培育三个维度转化落地,打造彰显贵州地域特色的德法共治样本。

第一,以致良知、责善劝和赋能基层矛盾柔性化解,实现事心双解。贵

州基层家事、邻里、土地、村寨利益类纠纷多发,此类纠纷法律关系之外裹挟情感、民俗因素,单纯刚性裁判易出现案结事未了。将王阳明唤醒良知、互谅共善的理念融入本土多元调解机制,对接鼓楼议事、村寨协商等民族治理载体,坚持法治兜底、文化教化协同,构建多元解纷模式。调解跳出非赢即输的单向裁判思维,依托良知教化引导当事人自省共情,借助乡土情理共识促成和解,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第二,以省察克治、改过向善赋能轻微违法犯罪行为源头治理,夯实认罪治理根基。贵州基层涉网络轻微违法、帮信类犯罪多为初犯偶犯,行为人大多源于法治认知不足(尤其是刑事违法性)、侥幸心理驱动。将省察改过理念嵌入轻微违法治理全链条;前端依托阳明文化基地、乡村法治阵地开展普法教化,引导群众主动省察心念、抵制逐利侥幸,从源头防范涉网违法风险;中端对认罪认罚、情节轻微的行为人,依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托改过教化探索开展不起诉帮教、社区矫正,矫正认知偏差;后端持续开展自省教育,培育守法自律意识,降低再犯风险,破解轻微犯罪反复治理难题。

第三,以知行合一理念赋能本土法治文化培育,构建贵州法治文化主体性。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建构文化主体性的要求,深挖龙场悟道独有的本土文化资源,推动阳明治心文化与贵州民族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整合阳明文化展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基层法治广场等阵地,打造传统文脉与现代法治相融的基层宣传载体,将知善守规、依法行事的内涵融入常态化普法。摒弃单向灌输式宣传,以知行合一为导向推动法治文化浸润乡土,引导群众把法治认知转化为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稳定行为自觉,持续厚植法治贵州基层文化根基。

〔作者曹波系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作者罗胜宝系贵州大学法律硕士。本文系贵州省2023年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轻罪治理背景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编号23GZYB150)的阶段性成果〕

乡村劳动力向外流动背景下,隔代教育成为农村初中较为普遍的家庭教育形态。部分隔代教育学生存在亲情陪伴缺失、手机沉迷、情绪疏导渠道不足等心理困境。本文立足农村初中学情,以美术、英语、历史学科为抓手,探索多学科浸润、家校社联动的实践路径,将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融入日常教育,为乡村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践参考。

一、隔代教育背景下乡村初中心理育人的现实困境

城镇化推动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许多青少年由祖辈监护照料,隔代教育成为乡村突出的教育现实。祖辈能够保障学生物质生活,但受认知水平限制,很难关注青春孩子内心世界。家庭情感支持缺位,使得不少隔代教育学生自我认同不足、抗挫能力弱,部分学生沉溺短视频、游戏,疏远现实人际交往。

未成年人保护倡导家校社协同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但农村初中心理育人仍存在现实短板:专职心理教师不足,心理干预多停留在班会课和个别谈话;学科教学偏重知识讲授,忽视情感熏陶的育人价值;面向隔代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形式单一,可操作性不强;社区阵地与学校教学联动不足。

初中是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仅依靠零散的心理辅导,难以惠及全体隔代教育学生。立足现有办学条件,挖掘人文学科课堂育人价值,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

二、未成年人保护介入隔代教育学生心理培育的现实意蕴

(一)回应隔代教育学生内在的情感成长需求

从学生个体成长来看,隔代教育学生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思念亲人、学业挫败、缺少倾诉对象带来的压抑,很多学生难以用口头语言表达。借助绘画、书信、历史故事等课堂载体搭建情绪出口,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学会感恩与换位思考,提升挫折承受能力,引导理性看待手机网络,减少对虚拟世界的精神依赖,实现身心协调发展。

(二)优化隔代监护模式,修复家庭内部沟通生态

在家庭层面,多数隔代监护人疼爱孩子,但教育方式容易走向两极,或是过度溺爱,或是简单粗暴批评,不懂得识别青少年情绪信号。面向祖辈开展通俗化家庭教育指导,传授沟通、情绪识别的实操方法,帮助监护人读懂孩子心理需求,改善家庭沟通氛围,弥合异地亲子关系情感裂痕,切实提升隔代家庭教育质量。

(三)凝聚乡村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从社会发展角度,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保护突破校园边界,推动学校联动村委会、五老志愿者等社区力量,延伸育人场景,构建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育人闭环,营造关爱乡村未成年人的社会氛围,降低青少年心理风险,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三、隔代教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实践路径

(一)深耕学科课堂,依托多学科载体实现心理浸润心理品质培育是学科教学的有机渗透,不额外增加课时负担,面向全体学生开展。

美术学科发挥艺术表达优势,培育学生自信、感恩与自律品质。利用“我的祖辈”主题绘画、手机主题漫画创作,搭配黏土、黏土手工,绘向学生提供非语言表达渠道。课后依托兴趣小组,在征得学生同意后展

初中隔代教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实践研究

■龙琦

示优秀作品,邀请民间艺人进校园开展手工教学,增强学生自我认同感。

英语学科重在情景沟通训练,提升学生沟通、感恩意识。结合课堂设置家庭情景对话,给父母书写英文书信任务,降低语言难度,不以语法完美作为评价标准。通过英语角、小型情景短剧、书信邮寄活动,帮助隔代教育学生向远方父母传递心声。

历史学科依托文化浸润,培育责任担当与抗挫品质。结合本土红色资源以及司马迁、苏轼等逆境成长的历史人物,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挫折。开展乡土调研、红色遗址研学等实践活动,厚植家国情怀,磨炼学生意志。

教学过程尊重学生差异,不强制当众发言展示,采用小组交流、书面表达等多元参与方式,避免“一刀切”加重内向学生心理压力。

(二)强化家校协同,赋能隔代监护,修补家庭情感链条

仅靠学校课堂很难实现持久的心理转变,必须补齐家庭教育短板。学校要跳出只反馈学业成绩的固有思维,把隔代监护人能力提升纳入育人工作。

1.因地开展开展隔代监护人专题培训

结合农村农事节奏,采用家长会、坝坝夜话等灵活形式,讲解初中生青春心理特点,传授情绪识别、家庭沟通、居家手机管理等实操方法,摒弃晦涩专业术语,输出祖辈听得懂、用得上的建议。对于农忙无法到场的家庭,通过微信推送文字、短视频材料,结合上门家访完成一对一宣讲。

2.构建多元载体维系异地亲子情感

推行弹性的亲子沟通引导,鼓励学生每周固定时段和务工父母视频,沟通不只局限成绩,多分享日常生活与内心感受。常态化开展亲子书信活动。建立外出务工家长微信群,推送青少年心理科普,提醒家长重视孩子精神陪伴。教师建立家庭跟踪台账,结合家访和在校观察,动态调整教育引导策略。

(三)盘活乡村社区资源,拓展未成年人保护实践场域

将社区作为校园教育的延伸,推动未成年人保护落地乡村真实生活。依托村委会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点,学校教师定期下沉社区,为有需要的学生开展情绪疏导。发挥“五老”队伍优势,邀请老党员、老教师进校园讲述本土红色故事与人生阅历,帮助学生树立正向价值观。

组织隔代教育学生参与村内环境清扫、关爱孤寡老人等志愿服务,充实课余时间,缓解学生对短视频、游戏的过度依赖。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涵养感恩意识与责任担当,为社交圈狭窄的学生创造同伴交往机会,拓展学生成长空间。

四、结语

隔代教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要正视乡村亲情缺位、监护力量不足、心理资源有限的现实。学生心理成长是缓慢且存在反复的过程,不能奢望几次活动就实现彻底转变。

将心理培育融入美术、英语、历史课堂,重在挖掘学科本身的情感熏陶价值,实现知识传授与心灵滋养并重。同时学校不能独立完成全部育人工作,必须做好隔代家庭赋能,激活社区本土资源,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

乡村教育没有通用的万能模板,教师要尊重隔代教育学生的个体差异,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立足课堂与日常沟通回应学生真实情感需求,守护乡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盘州市旧营乡中学。本文系2026年贵州省青年发展研究课题一般项目《护苗行动视域下初中隔代教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QNYB26035)阶段性研究成果〕

贵州“村字头”品牌IP矩阵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

■张婷 谌曦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贵州以“村BA”“村超”为核心引领的“村字头”品牌IP矩阵异军突起,深度融合文体赛事、民族民俗、山地物产等多元乡土资源,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农文旅产业融合的标志性样本。这类IP根植村寨集体创造,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多元利益主体深度交织,传统面向商事主体的知识产权规制模式难以适配其发展需求。加强“村字头”品牌IP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既是守护乡土文化根脉、保障IP长效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运用法治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探索乡土公共品牌治理路径的重要实践,对推动贵州“村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输出全国可借鉴的法治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实图景:阶段性成效与结构性短板

近年来,贵州同步推进“村字头”IP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确权层面,截至2026年上半年,核心IP累计注册商标超1000件、版权登记超300件,数据知识产权实现零的突破。台江“村BA”截至2025年7月提交商标注册申请914件、获注册397件,通过马德里体系完成美国等4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布局;榕江“村超”截至2025年底商标覆盖45个商业领域,134件成功注册。“村BA”高质量专题数据集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评估价值1007万元,实现数据资产入表84.9万元,为全国乡村赛事领域首创实践。运用层面,产业赋能效应显著,2025年榕江、台江两大核心品牌合计接待游客超147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66亿元,较品牌出圈前实现翻倍增长,累计带动新增市场主体1.2万户,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增幅超400%。保护层面,已构建起“行政保护+司法保护+社会共治”的协同框架,恶意商标抢注得到有效遏止,法官工作站下村,检公益诉讼等创新实践成效突出,相关案例入选国家级、省级典型案例。

但当前保护工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五大结构性短板。一是注册布局失衡,呈现“先爆红、后确权”的被动特征,以“村超”为例,截至2023年7月全国抢注相关商标达265件,98%集中在赛事爆火后提交;权利类型覆

盖不全,防御性布局不足,各IP各自为政,区域布局呈现“黔东南一枝独秀”的不均衡格局。二是维权效能不足,基层专业队伍匮乏,多数县级市场监管局仅配备1-2名兼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三都水族自治县2025年仅立案查处侵权案件8起,罚没款仅0.24万元,跨区域维权成本高、周期长,侵权赔偿额普遍偏低,“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失衡问题突出。三是运营管理分散,跨IP协同保护机制缺位,数据知识产权运用整体滞后,多数运营主体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规范化程度偏低。四是价值转化单一,过度依赖文旅流量变现,知识产权直接收入占比不足5%,衍生产品同质化严重,价值评估与资产化机制缺失,金融赋能不足。五是协同联动不畅,政府部门条块分割、信息壁垒突出,政企村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缺位,多元共治格局尚未形成。

二、体系构建:五大维度闭环保护机制

针对上述现实痛点,立足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治理逻辑,沿着“预防—确权—运用—维权—管理”的全链条脉络,可构建覆盖五大核心维度的闭环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一是科学合理的注册布局机制。建立前置化恶意抢注防控体系,搭建省级“村字号”商标动态监测平台,对重点IP实施初审公告实时监测预警,优化商标异议与无效宣告快速响应机制,完善抢注主体失信惩戒制度。构建“商标为核心、版权为支撑、专利为补充、地理标志为延伸”的权利协同布局,推进核心IP全类别商标注册与防御性布局,推动版权与外观设计专利双重保护,探索“公共品牌+地理标志”联动保护模式。建立省级统筹的三级梯度注册体系,推动跨IP联合防御。

二是高效联动的协同维权机制。实施基层维权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县域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完善基层维权援助服务体系,搭建乡村知识产权信息员网络。建立多元化维权成本分担机制,设立专项维权基金,推广知识产权侵权责任险,优化维权程序与证据规则,缩短维权周期,加大侵权惩戒力度,明确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形。构建“调解优先、行政裁决、司法保障、仲

裁补充”的多元纠纷化解体系。

三是规范有序的运营管理机制。设立省级“村字号”品牌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建立常态化协同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统一的品牌授权管理规范与合同模板。推进数据知识产权培育运营,规范数据确权与治理标准,拓展商业化路径,健全数据安全合规体系。推动运营主体设立专门知识产权管理岗位,建立全流程内部管理制度与资产台账,实施知识产权经理人制度。

四是多元高效的价值转化机制。构建“赛事+产品+渠道+空间”全品类授权体系,推动从短期营销联名向长期深度合作转型,深化东西部协作“品牌+制造”模式。升级衍生产品产业链,建立文创设计创新中心,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向高端化、定制化、体验化方向延伸。建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推进资产入表与证券化探索,创新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

五是全方位的风险防控机制。搭建一体化风险监测平台,覆盖电商、直播、线下市场等重点领域,实行风险分级分类管理与闭环处置。构建跨部门、政企村、社会多元主体协同防控体系,形成联防联控合力。建立品牌价值维护与异化防控机制,明确负面清单,保障公共利益与集体权益,守护IP乡土本真。

三、落地路径:分层分类实施与配套保障

结合“核心引领—特色成长—区域培育”三级IP架构,应实施差异化落地路径,避免“一刀切”造成的资源错配。核心引领层IP实施全链条高标准保护,配备多类型权利,设置专职管理岗位,深化资产化与金融创新,发挥示范样板功能。特色成长层IP实施重点补强轻量化模式,优先补齐核心商标、版权确权短板,设置兼职管理岗位,依托公共服务弥补人才不足,规范授权运营。区域培育层IP实施公共服务兜底模式,以版权保护为重心,仅开展必要商标注册,依托基层公共服务站点完成确权注册,严格控制保护成本。

针对机制落地的现实堵点,需配套五大保障举措。一是完善地方制度供给,依托地方知识产权条例修订,细化民族民间集体文化资源保护条款,出台省级“村字号”品牌知识产权管理

指引。二是构建多层次财政金融扶持,设立省级专项扶持资金,向成长型、培育型IP与欠发达县域倾斜,开发适配乡村文旅IP的金融产品,建立维权成本分担机制。三是创新人才引育机制,实施专项人才培养计划,推广柔性引智与智库服务模式,夯实基层公共服务站点能力。四是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平衡市场化运营与公共属性,防范过度商业化消解乡土底色,也破除“谈商业化色变”的保守认知,形成良性发展循环。五是健全跨区域协同维权机制,推动重点IP纳入全国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建立跨省线索移送与平台快速处置通道。

四、范式提炼:“1-3-5-N”可复制保护模式

在实践探索基础上,可凝练形成适配山地乡村公共IP、可复制推广的“1-3-5-N”知识产权保护模式。“1”即一个核心坚守,牢牢守住群众主体的公共属性底色,保障村集体、村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知情权、参与权与收益共享权,推动IP价值反哺乡村发展。“3”即三级梯度分类实施,根据不同层级IP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匹配差异化保护策略与资源投入,兼顾保护实效与经济可行性。“5”即五大链条闭环运行,转化为确权、运用、维权、管理、风险五大业务闭环,覆盖IP完整生命周期。“N”即N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营、村社参与、司法保障、社会监督的多元治理格局。

该模式立足贵州山地乡村治理语境,着力破解公共乡村IP权属界定模糊、收益分配失衡、维权成本过高、保护过度依赖财政等现实难题,不仅适用于贵州全省“村字号”IP矩阵的高质量发展,也可为全国同类群众性乡土公共IP的知识产权治理提供参考。“村字头”IP知识产权保护是动态优化的长期过程,未来仍需持续探索完善,让知识产权制度更好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张婷系法学博士,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作者谌曦系贵阳人文科技学院讲师。本文系2026年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联合课题):贵州“村字头”品牌IP矩阵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研究(编号:GZLCJLH-2026-20)的研究成果〕